


历史的转折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谭虎娃 著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正如《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海伦·斯诺所说的，在延安“人不可阻挡地前进着”，“共产党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

 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转折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谭虎娃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 谭虎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 - 7 - 01 - 018793 - 8

I. ①历… II. ①谭…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1935—1948 IV. ①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8702 号

历史的转折

LISHI DE ZHUANZHE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谭虎娃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01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8793 - 8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前 言 延安的道路	001
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010
第一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 011	
第二节 中央红军长征与落脚陕北 / 019	
第三节 中共中央扎根西北革命根据地 / 024	
第四节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大会师 / 034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037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037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 047	
第三节 延安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 / 052	
第四节 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指导中心 / 061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	071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成立及发展 / 071	
第二节 抗日民主的模范政权建设 / 081	
第三节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094	
第四节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 / 114	

第四章 革命链条上的“两个环子”——大生产运动	136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危机 /	136
第二节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	157
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	162
第四节 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	173
第五章 革命链条上的“两个环子”——延安整风运动	180
第一节 发展壮大中出现的问题 /	180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	186
第三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始末 /	203
第四节 实事求是权威的树立 /	210
第六章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215
第一节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215
第二节 长期的筹备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	222
第三节 中共七大的召开及其历史功绩 /	227
第四节 抗战胜利时的庆祝与斗争 /	233
第七章 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240
第一节 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骗局 /	240
第二节 从保卫延安到转战陕北的战略转变 /	246
第三节 西北解放战争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 /	253
第四节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258
结束语 延安的魅力	265
参考文献	279

前言

延安的道路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延安吴起镇。从这一天起，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就开始了，延安时期就开始了。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陕北“立足”，“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会议并指出，我们在这里将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陕、甘、晋三省，将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待了11天之后，继续前行。10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和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川南下，经金鼎、石畔（均属今志丹县），于11月2日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谈及陕北“肃反”问题时，毛泽东立刻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等带工作组前往调查。王首道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叮嘱说：“杀人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

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①中共中央的到来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释放出来。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离开下寺湾，前往史家湾，以指挥苏区南线作战。同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率中共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

11月7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罗迈（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直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12月13日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亦随之迁入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其为陕甘晋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西北办事处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由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林伯渠任部长）、土地部（王观澜任部长）、国民经济部（崔田民任部长）、教育部（徐特立任部长）、司法内务部（蔡树藩任部长）、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工农检查局（罗梓铭任局长）。翌年一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交际处（伍修权任处长兼秘书长）。在瓦窑堡，中共中央进行了东征和部署了西征。1936年2月7日，毛泽东在部署东征时在榆林清涧县袁家沟写成了光耀千秋的历史巨篇《沁园春·雪》，4月14日，东征中陕甘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遭国民党军阻击牺牲。4月20日，刘志丹的遗体运回瓦窑堡，24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致辞。后来，毛泽东给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36年6月14日，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并将其让给张学良，从而使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可以向国民党中央邀功请赏。但出乎预料的是，6月21日，国民党军张云衢部突袭瓦窑堡，加之红军主力西征，瓦窑堡仅留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部分红大学员，为更好地指挥西征，避免同敌进行不利决战，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当天下午2时许，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走出南门，当晚住李家滴哨，后经凉水湾、真武洞、侯家湾，7

^① 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月3日到达保安县城。

7月9日,《红色中华》报第286期第一版发表题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经定都志丹县城,志丹县已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有下列意义:(1)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当的地方;(2)志丹接近陕北,便于指挥和领导;(3)便于争取东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4)退出瓦窑堡决不是放弃苏区,不是逃跑。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进行新闻封锁,对外宣传红军已被彻底消灭。对此,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就在西北办事处内专门成立了外交部,由博古兼任部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开展外事活动。中共领导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邀请一位能够客观报道的外国记者来记录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1936年6月,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请求^①,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阻拦,进入陕北苏区。7月11日,斯诺来到保安,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老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志丹县城迎接。在保安,7月15日,与毛泽东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的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②。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引起极大轰动。该书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就重印了3次,销量达10万余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发行该书美国版,一个月就卖掉1.2万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此后,该书被翻译成法、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1938年初,在胡愈之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共党员推动下,由林淡秋、梅益、王厂青、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斯诺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对原著作了少量的增删,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未曾发表的图片,并且为

① 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毛氏会见记》,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4页。

中译本写了序。2月10日，用“复社”（既有学习明末江南爱国志士的“复社”，又有复兴中华之意）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西行漫记》在“孤岛”（上海）问世。《红星照耀中国》让中国共产党再次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很多爱国青年，正是背着《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2月17日，驻扎在延安城内的东北军迅速南撤到洛川一带，以防止国民党中央部队武力进攻西安，红军接防延安。同日，周恩来前往西安，22日晚会见蒋介石，12月24日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起来。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从保安启程，历经寺儿台（今志丹县双河镇）、高沟口（今安塞县王尧镇）、碟子沟（今安塞县沿河湾镇）等地，历经4天，行程216华里，在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高永祥等200多人相迎下进入延安。稍事休息，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为毛泽东、朱德等接风洗尘。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是革命圣地。

凤凰山是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毛泽东先后在李家窑院和吴家窑院居住。1937年2月9日，毛泽东在李家窑院会见了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与之通宵长谈。毛泽东向范长江讲解10年内战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范长江从此立场转向亲近中国共产党。范长江后来将采访所得整理为《陕北之行》在《大公报》上发表，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的封锁，促进了全国人民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传播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3月1日，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第一位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1938年春，由于李家窑院过于潮湿，毛泽东早年患过的关节炎再次复发达到了举箸困难的程度，毛泽东搬入离之不远的吴家窑院。4月，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

到没有。”^①在凤凰山居住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旧城受到严重毁坏，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迁往延安城西北3公里处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毛泽东把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比作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没有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②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三天，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针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③的问题，抓住、解决了文艺问题的中心，即“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④。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庄重申明：“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⑤。

随着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进入杨家岭，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大礼堂完成修建，杨家岭人多嘈杂，极不利于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工作与休息，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延安城西北7.5公里处的枣园。当然，中共中央书记处迁往枣园还有一个安全考虑的问题，就在搬迁之前的7月15日，担任中共中央审查干部工作主要负责人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认为延安“特务如麻”，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待的任务”。康生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延安和整个边区处于一种肃杀紧张的气氛之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

1944年9月5日，毛泽东的内卫班战士张思德在安塞县烧木炭时牺牲，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把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叫到窑洞里，详细询问情况。他严肃地说：“前线打仗，免不了要死人；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不应该。”随后，毛泽东作了3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队操场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这里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因过度劳累，身体欠佳，便由枣园移住城东二十里处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疗养。^③约两个月后，身体好转，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军事，移住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王家坪。国民党于1946年6月发动的全面内战被粉碎后，从1947年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开始重点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

3月20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徐家沟，21日转移到高家岭村。3月25日，西北野战军打了青化砭战役，歼敌4000人。3月29日凌晨到清涧县的石嘴驿乡的枣林沟村，当天晚上召开枣林沟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成立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副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3月31日，在绥德县田庄，刘少奇、朱德乘车前往晋绥解放区临县。4月5日黎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到了靖边县青阳岔。4月12日，转移到“位于小山沟里，紧贴着西山脚下有十几户人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③ 参见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黄土斜坡上几排窑洞”^①的王家湾。因为村子太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住在两间半的一孔大套窑洞里。在此居住期间，毛泽东总结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制定“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领导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6月8日夜，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向靖边县小河转移。“小河村是这一带比较大的村子，群山环抱，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优美而安静”，“河滩上，有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来间砖砌的瓦房式窑洞，三面排开。门前有一棵大树，树叶茂密，好几个人围不过来”^②。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8月1日，中共中央离开小河。8月19日，毛泽东到了佳县兴隆寺乡梁家岔村，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了沙家店战役。8月23日，毛泽东一行来到朱官寨乡朱官寨村。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作战，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12万人；指示明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③因朱官寨距离榆林较近，敌人出没无常，经常骚扰，张俊贤两次写信建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神泉堡。9月21日，毛泽东离开朱官寨，23日到达神泉堡村。在这里，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期间，毛泽东带十几人去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底、吕家坪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佳县白云山，毛泽东看了晋剧《反徐州》，并指示以“亚洲部”的名义，给佳县群众剧团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与时俱进”；又以“长江部”的名义，赠旗一面，上写“人民喉舌”。11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来到“村子规模大，窑洞多，群众基础也较好”^④的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居住了4个月，是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① 闫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② 闫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

④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1948年3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讨东渡黄河的问题，充分考虑到了“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①，次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②。3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下午到绥德县吉镇。3月22日上午离开，下午到佳县刘家坪。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到吴堡县川口渡口，毛泽东在黄河边上看到水很黄，说道：“看来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很厉害，若干年以后，要整体规划和治理。”毛泽东还对送行的人讲道：“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们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和友谊。”^③东渡黄河后，中共中央进入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共历时一年零五天，途经12个县数百个村镇，住过30多个地方，行程2000多华里。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至此结束。1948年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突围重重困境、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再次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历史。这些变化，使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95年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央从前线调回许多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对此，有些人不适应，发牢骚，闹情绪，毛泽东得知后于1940年底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他们，风趣地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

①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③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1页。

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①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共 159 篇文章，其中在延安时期写成 112 篇，占到了总量的 70%；《毛泽东文集》1—5 卷收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 504 篇，其中延安时期撰写的 385 篇，占到 76%。其二，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② 毛泽东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概括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其三，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贺函后，10 月 26 日，毛泽东亲自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回如下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 1936 年到 1948 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这是毛泽东对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高度的、非常到位的评价。

① 《伟大的历程》，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84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7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①，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任，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9月，中共中央在甘肃哈达铺了解到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毛泽东提出“要到陕北去”。10月19日，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镇，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

^① 《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第一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大部分地区终日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覆盖，旱涝雹冻等灾害频发。加之军阀、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群众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日子。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只能在经济、文化、社会十分落后的区域扎根、发展。陕甘宁根据地在旧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的落后的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交通不便，农民终日劳动难得温饱。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多；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①。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 1936 年 7 月徐特立向他讲述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前文化教育的状况：

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利的！这里的人平均

^① 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1 页。

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人和其他地方都多。^①

1939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政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延安，社会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妇女地位低下。在陕北，传统习俗认为，妇女就是“烧火做饭，养儿抱蛋”，“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官凭印，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这样，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完全屈从于男子，对于社会、父母以及丈夫的责难，只能逆来顺受，毫无经济自由可言，婚姻自由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二流子”众多。“二流子”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地痞流氓将近500，占人口总数的16%，1937年延安县人口3万左右，地痞流氓为1692人，占人口总数的5%。1937年革命政权建立后，农村恶势力被推翻，地痞流氓急剧减少。但新的流氓也不断产生，和旧社会以敲诈勒索、拐骗抢劫、帮助土豪劣绅欺压良善为业的流氓相比，他们显然没有那么恶、其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解放前比也逐渐微弱，但毫无疑问他们成为边区这个新生的社会发展的消极势力。

最后，土匪横行。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至1936年，陕西共发生兵变十多次，失败者大部皆上山为匪，而地方军阀为壮大实力大肆收匪为兵或纵兵为匪，导致了“土匪如毛”局面的出现，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陕西匪众多达10余万人。陕甘两省交界处，土匪多则成百上千人，少则数十人，其中大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0页。